

世界大學評比須權衡學術自由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大學承載著高等教育的希望，想像一下如此代表社會活力、前瞻性的學術殿堂中，教授開始授課，但所有語句都被靜音，螢幕上的所有幻燈片均為空白，指定的文本中的所有段落被塗黑。

這是在世上一些排名最高的學術機構中存在的真實，大學在學術和創作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的環境中運作，教授和學生會因討論不贊成的話題或提出某些問題而被解僱、開除或面臨更糟的風險。

但從目前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中沒有人看得出來這些景象，因為無論是 3 個最常被引用的排名，包括 QS、泰晤士高等教育、上海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或任何其他主要排名，都未揭示學術自由在最高品質教學和研究中的核心作用。

這些評比使用各種方法將學術成就和聲譽狹窄定義為比率和產出的函數，例如出版物，引用文獻和享有盛譽的獎項和募得的贈款。以致處於壓迫性環境中的學校位居聲譽評比的首位。誤導潛在的學生、教職員工和合作夥伴，並使他們處於危險之中。壓制性國家和高等教育當局可以限制學術自由，而不會招致聲譽損失。

為什麼要在乎？部分原因是在一國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已外擴到國外，對境外的學術自由限制正在上升。身處海外的教授和學生進入教室和實驗室，因為擔心遭到報復 – 對自己或留在母國家人的報復 – 而噤若寒蟬，妨礙知識交流和意見激盪。

我們在乎的更重要理由是，因為學術自由是品質的保證。學術自由 – 教職和研究人員根據證據、事實和因果設定研究議題並與同事、學生和公眾交流研究結果的自由 – 是賦予學術界能夠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力量。

缺乏學術自由情況下，教學課程和研究議題往往是由狹隘的利益決定的，通常是政治性利益，但有時是商業性或公共性的 (communal)。自我檢查 – 好比智力創造和發現產生癌變 – 然後轉移，從政治上最敏感的話題和學科，例如社會學、政治學、人權和性別研究，到深入貫穿整個學術體系。然後是人才枯竭 (brain drain)，可能發生在不同國

家和/或一國之內，從公共領域的研究和教學一直漫延到其他領域。

這些排名是同謀嗎？由於評比指標不包括學術自由，這些國際評比公司掩蓋了危害，讓人們錯以為學術自由是不必要的奢侈。吹捧顯示出卓越能力的數字，而不考慮學術和個人自由。

這並不意指排名公司故意為之。對大學進行評比和排行並不容易，大學是多層面的，各自在不同的環境下運作，有時甚至在同國家內也有很大的不同，更不用說在世界範圍內。關於各種評比方法和指標的合理性，有許多重要的學術討論。

學術自由本身在概念上很簡單，但在實踐中卻很複雜，不僅需要評估法律和政策保護，還需要評估在實際實踐中的實施限制。同樣地，要證明學術自由與教育品質之間的聯繫也很難（但並非不可能）。由於以上的挑戰，排名公司可能會因為未在其系統中納入學術自由而被寬恕。

但自 2020 年起，在德國的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瑞典哥特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V-Dem Institute）、國際學術網絡機構 Scholars at Risk 和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合作努力下推出了第一個全球「學術自由指數」（Academic Freedom Index，簡稱 AFi）；並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發布更新版的 AFi 2020 後，情況已改觀。

更新的 AFi 2020 數據運算借鑒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約 2,000 名專家的貢獻，涵蓋 175 個國家和地區（第一版為 144 個國家），橫跨 1900 年至 2020 年期間。數據資料都可公開取得，還有超過 14 萬個觀測點、多項指標，以及基於貝葉斯測量模型所製作的學術自由綜合指數，標示學術自由度高和低的國家，為學者、大學主管、政府、捐贈者，尤其是大學排名公司提供了獨特的參考。

排名公司現在可以使用 AFi 數據來減輕排名結果失真的風險，並揭示學術自由的潛在限制。由於排名公司和方法不同，因此有許多可能的作法。最直接的方法是應用 AFi 數據的乘數或折扣來校正大學排名中的失真。

以 QS 排名為例，大學總得分在 0 到 100 之間，然後依照 AFi 與

當前決定得分的常規指標的權重比進行計算（例如 20:80），以更正大學在排名中的位置。這等同對同低自由度國家的大學進行處罰，按比例呈現在得分上。例如，在最新的 QS 全球排名中，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分別排名 23 和 24，總分為 83.5 和 83.2。東京的更正分數將是 78.4，而北京將被降低到 68.2。這些權重調整後的分數更好地反映了各自大學的卓越表現，包括學術自由。

另一種方法是將 AFi 與其他指標一起計入初始分數中計算，而不是作為加權折算。學術自由可以被認為是背景因素（background context factor），有如資源，或用來衡量卓越性。但這可能會造成其自身的失真，尤其是在排名較低的大學中，即使 AFi 指數較低，其得分也可能顯示不出意義。

除了調整計算之外，排名公司還應至少使用 AFi 數據來提供背景資料（context）。他們可以在網站和報告中突顯 AFi 數據以及排名結果。用圖表標示 AFi 分數的構成要素以及側邊欄揭示某個國家或地區的背景限制，從而提供有價值的訊息，以供考慮與特定機構進行跨境活動的學生、教職員工和機構進行風險評估。

而這也可以為希望改善學術自由狀況（以及因此而獲得的 AFi 評分）的機構和高等教育系統提供一個路徑圖（roadmap）。

如果不在他們的計算範圍內或作為背景，排名公司也可以將學術自由作為決定參與排名的前提。許多排名系統依賴於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和主管階層的自願性參與及自我提供的數據。除提交這些資料外，排名公司還可以要求大學聲明其對學術自由的承諾，並披露任何相關的事件、政策或做法，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為列名在排行榜中的先決條件。

將這些承諾和訊息公開化，例如在其網站上或在排名報告中揭露，將可提高透明度。這將使利益相關者能夠將自我報告與 AFi 和其他數據來源進行比較，從而支持加強學術自由的研究、倡導和對話。

為強化學術自由，我們必須將學術自由恢復為學術聲譽和品質的關鍵標準。在 2020 年之前，排名公司可能因其系統中不包含學術自由而被寬恕，但此景不再。排名公司處於獨特位置，可以藉用 AFi 指數來改善大學的評比，如此可以創造強大的動力，讓重視並根據指標

爭取盛譽的大學校長和政府，採取相應的措施加強學術自由。

排名公司是否願意，尚有待觀察，但很明確的是：不希望被視為違反學術自由行為幫兇的排名公司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將學術自由納入評比，或清楚說明無法達成的理由。

本文作者 Robert Quinn 是每年向全世界 300 多名受到威脅的學者提供庇護和援助的 Scholars at Risk 執行主任，也是「自由思考」播客（Free to Think podcast）的主持人。Janika Spannagel 和 Ilyas Saliba 是設於德國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GPPi）的研究員。

撰稿人/譯稿人：藍先茜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2021 年 3 月 11 日，大學世界新聞、GPPI 網站資訊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10311071016522>

<https://www.gppi.net/2021/03/11/free-universities>

